

第
3
代
学
人
自
选
集

線

1
山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汪丁丁 著

通向 林中空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向林中空地 / 汪丁丁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 王元化主编)

ISBN 7-5328-2678-3

I . 通… II . 汪 III . 经济学 - 文集 IV . R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616 号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通向林中空地

汪丁丁 著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2023919 传真: 201145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15.5 印张

插 页: 5 插页

字 数: 358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2678-3/G·2464

定 价: 22.3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茅三代學子
自述集

清園主人

目 录

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代序）	003
不是“前言”的前言	
——《永远的徘徊》自序	017
《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自序	021
《我思考的经济学》自序	024
《梦幻与真实》自序	030

制度创新、经济发展、
制度经济学

经济制度的真正涵义是什么？	037
“效率”所要求的……	041
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一）	047
为《读书》写的经济学（之二）	056

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	066
从麦当劳餐纸说起	098
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104
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	111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危机	153
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应当超越“交易 费用”理论?	166
 “人”的经济学、道德哲学、 知识社会学	
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第一部分）	173
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第二部分）	197
市场社会的“道德基础”（通论） ——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 （第三部分）	226
为什么“边际效用递减”?	254
游戏·意义·知识结构	260
“经济”原考	269
乌托邦与传统 ——永远的徘徊	274
讲故事的逻辑	281
“主义”与“科学”	287
知识社会与知识分子	293
在历史中阐释，在阐释中创新	

- 评“刘东—甘阳”之争 303
制度经济学关于世界的三个基本预设 316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重建

- 社会科学学术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 325
实践高于理论 333
关于出版《中国社会科学丛书》的设想 340
“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涵义 345
学术刊物审稿制度刍议 378
知识是怎样产生的？ 384
演进，均衡，理性
——写给寻找新经济学的人 391
面向综合的时代
——兼评《复杂》 396
知识：互补性与本土性 406
试说“现代性”问题
——兼评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
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436
试说“后现代性”
——兼评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447
告别 462
- ## 未来
- 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 473

“克隆”，互联网，平面化倾向及其他	481
棕榈树下的沉思（代后记）	488

1

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代序）

正像这套丛书的宗旨所说的，我和其他人差不多，可以算是我们共和国的同龄人。不过每次问到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觉得回答起来颇费口舌。我几乎是刚刚出生在沈阳和平区的一家医院，就被带到了北京。在北京长大，应当算是“北京人”了。但是每次填“籍贯”还是受到“祖宗”的影响，必须算是“浙江人”。其实祖宗的影响也分父系和母系两方面，因人而异。在我们家的血脉里，父亲是独生子，要算“成份”的话，算是“中农”出身，一辈子老老实

实。母亲出身更复杂了，外祖父是民初的“新派人物”，自由撰稿人，生命历程曲曲折折，最后被日本人抓去，折磨死了。外祖母出身望族，是汉高祖的同乡，毕生投身革命，对全家族的影响最大，她送了家族里的一批晚辈，也包括母亲，去红色根据地。所以当父亲和母亲在晋察冀边区的窑洞里结婚时，就双方家族对“小两口”的影响而言，在北京话里就相当于“倒插门”——夫随妇居。大势所趋，外祖母始终保持着她对家族里的第二代人的影响，她对我们第三代子女的影响也远远超过“祖宗”里的其他人（我们甚至今天也不知道那些其他的祖宗们的名字）。我也吃不准是真是假，反正觉得我天生的两个互相关联的特点——记性好和想像力丰富，必须得归到外祖母家的遗传因素里去。至于后来显出来的“悟性”，那就不知道得归到哪一脉里了。家里书多，小孩子不论在哪间屋子里玩儿，都撞见书。这环境本身已经足以开启“觉悟”了。

小学四年级以前，我绝不是“好学生”，从哪一条标准来说都不是。记忆所及，我那时感兴趣的事情似乎就是：（1）逃学；（2）去钓鱼台抓蝌蚪；（3）在街摊旁看小人书。“钓鱼台”现在已经变成“国宾馆”了，那时候只是烂泥塘，枯水季节走在里面会陷很深，常死人的。我认识一个按照当时标准是“小流氓”的孩子，他带我去捞蝌蚪。所以我在家里有一个脸盆，里面养着许多蝌蚪。我观察它们怎么渐渐会跳出水面以及迅速地长出四肢。混到二年级时，大考不及格，因为我胡乱写卷子，我记得我是故意把每一题目的编号当做它的答案填到等号的后面。父亲是否教训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带着我去和学校“论理”，终于推翻了“留级”的决定。

偶然因素，中国人不承认，名之为“缘分”。我终于有缘分遇到一位老师，她是我们四年级的班主任。有一天语文课，

我仍然和从前一样做我自己的事情——“开小差”。突然张老师提到我的名字，说我的作文非常好。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shock（震惊）”。从进了学校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听到过任何老师表扬我。张老师的名字是“张鸣柯”，北京市模范教师，穷苦人出身，香山慈幼院毕业，一辈子奉行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原则。我碰到她，真是我的缘分。其实我那篇作文乱七八糟，就是用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成语。经过她那个“shock”疗法，我居然“浪子回头”，每一次作文都成了“范文”（在全班甚至其它班朗读），然后渐渐地，我的数学也开始名列前茅。那时候的“好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会有所思考，因为头上冠的那个“好”字的价值突然被颠覆了。我的幸运在于我刚好在文化革命开始前变成了“好学生”。有所思考就意味着读书。“罢课闹革命”那年，我已经抱着一本《国家与革命》，懂不懂是另一回事，自己在教室里读了。然后就是几十万毕业生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在另一本书的自序里说过了，这里空过不提。

我在其它书的自序里没有提过的对我后来生活意义重大的一件事情，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被母亲介绍给她的一位同事学习装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当时是比较困难的活动，因为半导体收音机的零件很贵，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的那个老师带我去买一个“三极管”，花了六块一毛六。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我学习过程。从只用一个三极管，渐进到装六个或者八个三极管的收音机。经验积累多了，就开始买《无线电》杂志，自学电子电路原理。我记得我去北大荒时只带了一本书，就是《电子线路》。我后来回到北京，因为兴趣的缘故，在一家电子研究所下面的工厂当工人。平时干的工作是电子仪器的调试，所以平时读的书也大多是电路、信号、数

学、物理方面的。到了1977年考大学，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了。

一件很说明我当时个人兴趣的事情是我报考大学的专业：（1）世界史，（2）数学。不过我没有考上北京大学的世界史专业，据说那个系那年不招收24岁以上的考生。不论如何，我从“第一志愿”落到了“第三志愿”，进了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紧接着，第二年开始招考研究生，我继续我在电路方面的兴趣，报考清华大学和北京邮电学院的研究生。无奈天生不是好学生，还是考不出“名列前茅”的成绩。回来继续啃数学。师范学院是培养中学教师的，在数学理论方面没有优势。不过“七七级”确实积十年人才于一年，同学们都是非常聪明和用功的。我算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之一，因为得到过校长的表扬；但绝不算用功的学生，因为我很少上课，总在图书馆或家里读自己感兴趣的书。许多老师只是到了期末考试才把我的名字同我的脸对上号。我不喜欢体育，所以体育课都是由一位同学替我喊“到”，直到最后“达标考试”我才露面，着实让体育老师迷惑了一会儿（因为在他眼里叫“汪丁丁”的一直是另外一个面孔）。

在北京师范学院的图书馆里，我读的次数最多的是黑格尔和罗素的书。这对当时数学系学生来说也算是“不务正业”了（罗素的《数学原理》除外）。我读罗素，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哲学问题》。那是一本很浅的哲学入门书，不过对当时的我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读马克思和黑格尔长大的，知识结构偏向于德国思辨哲学，对英美逻辑实证那一传统很少接触。罗素让我深入认识了休谟，后来我从休谟开始认识康德。我读黑格尔从来没有足够时间读完任何一本他的书。但是他的《逻辑学》导言，由于我每次都从头开始读这本书，于

是每次都得读这篇“导言”，也就印象较深了。这篇“导言”证明对我以后的思维很有影响。因为它让我明白了任何“科学”说到底都是不那么科学的，于是必须时刻注意到科学的局限性。这是我后来多年的努力所在。

另一件我在其它文章里没有提过的事情是80年代初我念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的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研究生时，有几个从事经济研究的朋友，正在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的中国”项目。他们缺少一个懂得数学方法的研究人员，于是就把我拉进那个项目里去了。十几年以后，我已经在香港大学教书了，竟然收到当时项目的主持人通过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辗转而来的一份证明我是参加“2000年的中国”项目的专家的证书。当时参加这个项目的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要人物了。不过我的印象是，当时参与项目研究的没有什么人可以称的上是“专家”，大家都是通过那个项目“练手”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在那个项目里，我参加的研究组是“人口与就业”，但那个组又分成几个专题组，我是在“就业”专题组里，具体负责预测和建模。我是控制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很自然就应用控制理论来计算所谓“最优控制”的政策建议。计算工具很缺乏，当时是求一位朋友在物资部的计算中心借用机时。我记得第一次拿到计算结果时，有些目瞪口呆。因为按照“最优控制原理”得到的就业人数越外推越远离常识，最后简直就是每年成倍地增长。好在我那个组的“召集人”，姓姜，他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他坚持拿着那份打印数据研究了几天，终于从中找出了一些合乎经济学道理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人再修改预测模型，重新计算，这样的过程进行了一些日子，我终于意识到，“数学是很好的仆人，但却是极坏的主人。”这是布尔丁的话，我在美国念书时读到的，深有同

感。当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就开始自学经济理论，像以前一样，仍是从《资本论》开始读。我的入门老师就是那位姓姜的经济学家，我们成了朋友，他经常抽大量时间和我一起讨论《资本论》里的问题，以及其它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的问题。每次请教问题，我去他那里，在西郊很远的地方。他请我吃饭，晚上才回家。那些日子我过得很愉快，充满了自信，觉得从以前读的那么多书里，开始生出了“体系”，生出了属于自己的体系。尽管，现在看起来，那是十分幼稚的“体系”，也可以说根本不是什么体系，尽管现在的我根本不愿意构造出一个体系，可是我非常感激我那位入门老师。我不能确信他现在是否仍然研究经济学，但我确信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佼佼者。他现在在哪里呢？

研究生快要毕业了，大家都联系出国读博士学位的事情。那时候中国科学院的毕业生很容易联系到美国的名牌大学的奖学金。我对找导师写推荐信那一类的事情始终提不起精神来，马马虎虎发了几封信，不了了之。我相信我性格里有一种随波逐流的宿命倾向，我从小就自由散漫，习惯了在大街上闲逛，看别人忙忙碌碌。我喜欢那种躺在海水里仰望碧蓝的天空的感觉。一个人，一生里会遇到无数的机会，意识到的和意识不到的，只有那些能够引起主体兴趣的机会才被把握住，追索下去，实现一些梦想。夏威夷，太平洋遥远的腹地里那一串火山形成的神秘小岛，引起了我最强烈的兴趣，给我原本就丰富的想像力开辟出犹如太平洋般广阔的空间。机会总是偶然的。我的一个导师是朝鲜族，他和宋健先生以及科学院—国家科委系统的其他一些学者们一起研究中国人口的“最优控制”问题，他结识了远方的一个研究亚洲人口问题的旅美韩国学者，那位学者刚好在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工作（是中心的副主任）

……再往下的事情就可以想象了。1985年3月1日凌晨1点，我飞过那条把地球分做东西两半的子午线。我的后面是2月28日（星期四）深夜，我的前面是3月1日（星期五）上午。到机场接我的段先生没有接到我，因为我自己叫出租车找到了东西方中心的宿舍。段先生是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从北京移居夏威夷很多年了。他家里常常设宴接待中国人，已经成了大陆中国学者在夏威夷的“家”。听说他现在仍然肩负使命奔波于夏威夷和北京之间。想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暮年老者，侃侃而谈的时候还是喜欢一边做手势一边说“stupid”？

夏威夷大学的图书馆里有许多中国文化方面的书籍。我在学校里，和从前一样，不是个经常出现在教室里的学生。但我肯定是那个地方最用功的学生。我知道图书馆里每一层楼每一片书架上摆的是什么书，我消闲的方式之一，是在图书馆里漫步，从地下室的资料地图，到一层楼的参考书架和期刊阅览室，再到二层楼的数学物理生物，一直到顶楼的哲学历史文化和东亚各国的旧期刊。我觉得那些架子上的书都是我的士兵，我在这些士兵的行列中间穿行，检阅，查看新来的成员，寻找失踪的老兵。

夏威夷大学经济系，我不知道在美国各种负责排名次的刊物上位置如何，只记得曾经在其中一份刊物上见过它的经济系排在第九十几名，又有一次，被排在第五十几名。北美有五千所大学，排在前一百所里面的，应当不算是“野鸡大学”，仅此而已。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经济系里是不会有著名教授的。但是有三个教授对我影响非常大。第一个是密勒，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在哈佛经济系的那份著名刊物上也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对学生要求极高，他教的学生期末考试分数从来没有超过89.5分的。我知道这个规则是因为我两次得到这个分数，觉

得不解，因为我在其他教授那里总是得到 90 分以上的。我去问密勒教授为什么只给我 89.5 分，他用那双永远带着几分讥讽的眯细了的眼睛打量了我几秒钟，反问我：你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是我历来给过的最高分数。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很喜欢我这个学生，他曾经专门去向在东西方中心任职的那位美籍韩国学者祝贺他找到了我这么一个学生。密勒对我答卷上经常出现的密密麻麻的数学推导不以为然。有一次下了课我拦住他，回答了他在课堂上提出的关于“包络定理”的一个思考题。我的结论是正确的，不过，他临走时甩给我一句：不要太相信数学。这句话我想了很长时间，在教科书上的“包络定理”从来都是通过数学证明的，为什么“不要太相信数学”呢？密勒的问题实际上在“2000 年的中国”项目里向我提出来过，第二次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远比第一次来得深刻。

密勒教授在我毕业前两年患了白血病，支付不起每日大量换血的费用，自愿停止治疗，结束了生命。我去墓地参加了对他的追思仪式。他是经济系最优秀的教授，所以大家捐钱建立了以他命名的基金和会议室。罗马塞特现在是经济系仅存的优秀教授了，他讲授许多不同的课程，从政治经济学到资源经济学。我和他成了“忘年交”。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喜欢将经济行为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都喜欢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狭隘性。我们兴趣都十分广泛，在哲学、科学、历史、文学等方面经常交换意见。我们还合作写了一些资源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不过他也许和我太相像了，我们两人的自由散漫性格使我们的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合作似乎永远无法产生能够发表在刊物上的实际成果。我们现在仍然有来往，但仍然没有能够合作发表一篇文章。罗马塞特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可以不动声